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刘涛雄 黄文夫 启文 赵红
李千 吴明伏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刘涛雄 丁茂战
主编:管益忻
常务副主编:启文 副主编:白卫星
编辑部主任:廉明 副主任:刘立华
主编助理:方芳

经济学家

周报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陈全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圆晨 范恒山 樊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葛志荣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磐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轼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第148期(总第260期) 2016年5月13日 星期五 丙申年四月初七 投稿邮箱:jxjzb@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35959 本刊订阅方法:网易“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66

李锦文中提到的国企改革(创新、重组、退出、优化)的“四个一批”,其中心都是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都是要通过资本化运作加大供给力度来实现的。

99

打造供给侧与国企改革协同机制微说 ——读李锦“正确认识国企改革与供给侧改革内在逻辑”

■ 管益忻 经济学家周报主编、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中心首席专家

李锦院长在他的“正确认识国企改革与供给侧的内在逻辑”一文中提到,一些地方对要搞国企改革,为什么还要搞供给侧发出疑问,这表明,尽管仍然有学者对供给与需求应两端同时发力,两手都要抓好(有所认识),但以供给侧为主导(的改革),越来越成为我们改革开放发展,特别是时下走出困境的根本之道。然而,在大力贯彻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方针的同时,如何使其与国企改革真正协调起来,协同运行发展,甚至“无缝对接”,的确是一个亟待回答和认真对待的重要命题。现在看来,最为重要的是协同机制如何打造。在做了些初步研究之后,本人以为,这起码应从以下几个侧面着手。

供给侧与国企改革协同机制之一:全要素生产率

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结果反映在经济增长模型方面,同国企改革一样均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讳言,提高全要素生产是我们前30年改革成功的主要经验之一,而现在,从宏观上提出的供给侧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微观基础,必须由旨在做强、做大、做优的国企改革来落实,而这正同国资资本化改革也是完全一致的。

李锦文中提到的国企改革(创新、重组、退出、优化)的“四个一批”,其中心都是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都是要通过资本化运作加大供给力度来实现的。这“四个一批”其中的核心主线是“创新一批”,创新的主要着力点,不论供给侧改革还是国企改革,都是五个核心概念之首。如“重组一批”,这即



集团重新定义产业链环节结构,把新松公司转型成为足以使自己升级换代的服务商,打造出了新的协同机制。这样,原本为地道的(传统)“中国制造”之正泰企业,在打造新松—华泰兼有制造、服务双重职能全新业务体系和产业流程中,使自己从纯(低级)制造华丽转身为高端的中国制造公司,成为现代制造服务业的公司了。

其二,在打造完备产业链中华丽转型升级。

在浙江另一种制造公司杭州新松中,“去年有段时间,平均一两周就有七八十家企业到新松参观洽谈。”其老板李正刚以其敏锐的战略眼光洞悉到:作为全球的主要制造工厂,中国市场正是“智能制造”的主战场。他审时度势地认定,尽管国内机器人产业有些过热,但市场需求仍在。为此,他们通过打造融产业体系、高新技术、核心零部件、领先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了华丽转身升级。

其三,在人、机、网联接中枢打造中实现华丽转型升级。

作为国内市值最大的安防企业,新松应用商之一的海康威视,去年营业收入253.28亿元,同比增长46.97%;净利润58.43亿元,同比增长25.23%。而这一骄人业绩的获得正在于其加大供给力度,加大R&D投入,通过一系列机器换人、工厂物联网和智能制造项目建设,保证了产能和品质不断提升而获得的。

而同样扎根“智造”的浙江力太科技,在其当家人李善通认定,智能制造平台既是工厂中人、机、料的联接中枢,又是工厂数据的集中地,更是工业安全的控制中心。

该公司从智能智造和智能设计两个层面入手,业绩不断攀升。制造业高水平不断提高再兼之其卓越的“工匠精神”,企业发展

蒸蒸日上。

在面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下,一批中国制造业的领军企业,正在给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孵化出转型升级新活力。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3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比上月上升了1.2个百分点,重新回到扩张区间。

供给侧与国企改革协同机制之四:资产负债关系

这一协同机制的提出,其缘由在于,从企业内部来说,要供给侧发力就必须在抓好负债(企业债特别是一些国企、央企负债)的同时,大抓资产供给及其优质化升级。这就是说,在企业内部贯彻供给侧方针同国企改革协同机制的打造,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一个原本即存在内在机制之统一的枢纽点就是资产负债表,资本同负债要协调统一。但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在关注到负债的同时,一定要下大力气加大投资供给,特别是投资效率,投资的科技含量,投资之创意、创新,软资产比重的大幅度提升。

另一方面,即使在去杠杆、去产能方面也不能“一刀切”,甚至“减法”中可能还有“加法”。例如在煤炭业中就有洁煤、清洁能源,这些是要发展的,而不可简单地去把这种清洁能源也当作为过剩产能“去”掉。在这方面,不可以笼统的“去”的,这里面的高科技还是大发展的。

不论是钢铁、水泥,还是煤炭、油气、有色金属、玻璃等都应具体分类,一类一策来解决。所以,结构调整很重要的上游板块要进行比较大力度的结构性调整。相互之间毫无原则地博弈,自己不动,专等别人去(产能)自己该去的不去,不在此例。

66

2016年新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剧烈的双向波动和人民币汇改面临的巨大挑战就已表明,改革方略即便正确,若没有审时度势的有序推行,往往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因此,改什么和怎样改,同样重要。

99

中国国企改革:从改什么到怎么改

■ 程实 中国工银国际研究部联席主管

对于金融市场而言,最大的危险是不确定性。一个模糊的利好信号,可能比一个确定的利空信号更容易引发市场担忧,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经济是一首“冰与火之歌”,减速增质是核心关键词,经济结构凤凰涅槃,经济转型万物生长。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心存忧虑,一部分是因为对增速下滑感到忧虑,更大一部分则是因为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缺乏信心。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核心动力是改革,缺乏信心既可能是对改革内容不满意,也可能对改革落实没把握。2016年新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剧烈的双向波动和人民币汇改面对的巨大挑战就已表明,改革方略即便正确,若没有审时度势的有序推行,往往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因此,改什么和怎样改,同样重要。

国企改革的政治周期

中国的改革是以提振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效率是经济效率的核心,因此,国企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国企改革的本质是体制机制改革,这意味着政治因素具有主导性力量。中国的国企改革周期,呈现出与政治周期高度的同步性,十年一轮,每一轮以十年为期,前三到四年为顶层设计阶段,后六到七年为贯彻执行阶段。以1983年、1993年、2003年和2013年为大致分界点,中国国企改革已成功完成三轮,正在进行第四轮。四轮改革核心分别是政企分开、产权改革、国资管理和义利重塑。

义务和利益的匹配机制重塑,是一个涉及简政放权和激励相容的敏感方向。正因为敏感又重要,所以,改革的方向必须坚定,改革的方式则必须务实。事实上,务实是本轮国企改革的核心风格,势必会在改革全盘中都有体现。以2016年3月两会为模糊分界线,伴随着“1+N”的陆续出台,本轮国企改革正从顶层设计阶段过渡到关键的贯彻执行阶段。

“试点+地方”模式逐步成形

根据笔者的观察,目前,在一系列改革新政的驱动下,本轮国企改革的执行路线不断清晰,“试点+地方”模式正逐步成形:

一方面,改革试点全面升级。2016年2月,国企“十项改革试点”落实计划公布,并将其作为今年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加以推进,标志着改革试点的全面升级。本次“十项改革试点”的内容包括: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试点、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企业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试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中央企业兼并重组试点、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工作试点、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试点。相比于2014年央企“四项改革试点”,本次试点不仅内容更为丰富,改革深度也实现大幅突破。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例,本次试点将深入部分重要领域,在电

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垄断行业推进混改。对于历史上屡遇困难、多次反复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改革,本次试点也将迎难而上,再度进行探索和完善。

另一方面,地方改革自主权持续增强。2015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指出: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基层改革创新,既鼓励创新、表扬先进,也允许试错、宽容失败,营造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浓郁氛围。今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也首次提出“赋予地方更多国有企业改革自主权”。目前,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已初步显现。2016年初,共有24个省、市、自治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地方国企改革进行了明确部署。近期,上海、广东、山东、江西、四川、重庆等地区的国企改革细化方案和试点计划相继出台,为改革落地提供了详细的实施措施。

“试点+地方”模式是务实的执行路线

原因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试点+地方”模式是可行的。所谓可行,就是能够协调改革的成本和收益,改革收益需要达到预期,改革成本则不能触及底线。从理论来看,“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形式从三个方面满足了这一要求。第一,试错成本低。由于试点的规模小、范围窄,试错成本可控,避免了激进式、全局化改革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或严重社会问题。第二,改革步伐大。由于成本可控,试点中更易于放开改革步伐,摆脱理论或传统的桎梏,在实践中直接形成制度创新。并且,同一批次的多个试点间会进行竞争性的制度创新,加速改革方案的成熟。第三,推广过程平稳。试点的成功能够有效地凝聚改革共识,减少思想分歧和改革阻力。同时,试点的经验提供了详细完整的操作方案,易于新制度的大范围移植。从历史来看,“先试点,后推广”始终是中国国企改革的基本形式。利税改革、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改革等重大制度创新

都在试点中产生和完善,再通过政策文件向全国推广。改革试点及推广期间,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未出现“休克疗法”式的剧烈震荡。

由于当前国内外经济进入双重“新常态”,本轮国企改革对于改革成本格外敏感。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遭遇“三期叠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尚在攻坚元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增长”正面临巨大挑战。重压之下,虽然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回落,但财政赤字率目标从去年的2.3%跃升至3.0%。在赤字压力上升的背景下,当前中国经济对于改革成本的承受能力相对有限。从国际来看,当前全球经济依然呈现弱复苏态势,潜在经济增长中枢持续下降,并伴随着严重的多元化退潮与全球化退潮。特别是2015年四季度以来,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高涨,与地缘政治风险相互叠加,各国间博弈日趋激烈。受此影响,“唱空”中国的声音屡屡出现,国际评级机构近期也加入其中。

因此,当前改革的外部干扰因素和潜在风险正在不断增强,更需稳中求进。基于国内外复杂形势,激进式、全局化改革无异于主动暴露软肋,可能引发难以承受的改革成本与风险。相比之下,“先试点,后推广”能够有效控制成本和风险,遵循了中国改革“蹄疾步稳”的一贯风格,是当前改革形式的较优选。

另一方面,“试点+地方”模式具有高效的执行主体。中国国企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均表明,地方政府兼具改革的动力与能力,能够在改革第一线发挥强劲的推动作用;第一,地方政府是最前沿的制度供给者。借由地方政府的力量和智慧,顶层制度设计才能适用于中国复杂多样的基层环境,并最终以各种具体形式提供给微观主体。第二,地方政府是最前沿的制度需求反馈者。地方政府与地方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存在长期合作博弈,对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最为敏感。在改革中,地方政府能够代表微观主体的合理诉求,与上级政府进行有效协商,从而为微观主体争取

正当的改革空间和政策资源。第三,地方政府在改革中还直接承担着制度创新的重任。在顶层设计未能覆盖的领域,地方政府的自主创新往往能够提供新的思路。其中成功的部分会为中央所采纳推广,进而惠及全国。

在中国国企改革的历史上,第二点和第三点相互结合,常常“自下而上”地攻克改革难点。例如,1981年春,山东省率先在所属国营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其后在全国得以推广;至1982年底,全国已有80%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35%的商业企业实行了经济责任制。

由于本轮国企改革的特殊性,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显得尤为关键。与之前的国企改革相比,本轮国企改革呈现两大新特征。首先,本轮国企改革是高度市场化条件下的改革。随着近年来市场机制的大幅完善,微观主体力量崛起,在本轮改革中拥有空前的话语权和议价权。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诸多领域,地方政府必须直面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并与其展开复杂的改革博弈。因此,只有及时下放事权,使地方的改革权力和改革任务相匹配,才能提高地方政府在博弈中的能力和效率。其次,本轮国企改革是一次全面深化的改革。本轮国企改革的挑战不仅在经济目标本身,还将直接触及就业、民生和诸多历史遗留问题。部分地区将存在较高的局部风险。地方政府能否妥善处理问题、兜底风险,能否兼顾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将直接影响该地区的国企改革的节奏和程度。因此,必须重视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给予地方政府充分的政策空间和适度的财政支持。

笔者认为,本轮中国国企改革的关键属性是务实,这是确保改革有序推进的前提。目前,本轮国企改革正从顶层设计阶段过渡到贯彻执行阶段,虽然改革进程显得有些不温不火,但无论“1+N”的顶层设计,还是“试点+地方”的执行模式,都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务实选择。中国国企改革,目标是理性的,过程是渐进的,虽然短期成果显现有限,但笔者对中长期前景依旧保有期待。